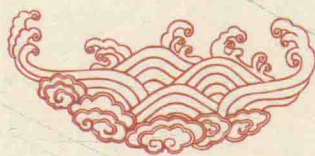


冯
杨◎著

效率、平等与国家的作用
三大学派的比较研究

XIAOLV PINGDENG YU GUOJIA DE ZUOYONG



冯 杨◎著

效率、平等与国家的作用 三大学派的比较研究

XIAOLV PINGDENG YU GUOJIA DE ZUOYO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效率、平等与国家的作用：三大学派的比较研究 /

冯杨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 4

ISBN 978 - 7 - 5196 - 0120 - 1

I. ①效… II. ①冯… III. ①经济效率—研究②平等
(经济学)—研究 IV. ①F014. 9②F0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6191 号

效率、平等与国家的作用：三大学派的比较研究

作 者	冯 杨
责任编辑	匡卫平 杨 嶂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 - 63567683 (编辑部) 010 - 63588446 63567692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edpbook@126.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6 - 0120 - 1
定 价	68.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冯 杨 1975年12月生于成都，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6年至今任教于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现为副教授。自撰写博士论文以来，作者就一直关注并研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已出版独立学术专著《转型时期的国家角色探讨》（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出版），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篇。

近年来由于跨学科的学习和阅读，开始转入更为广阔的现代国家治理、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等视野，希望进一步对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演绎互动，进行更为宏大的对比观照和深入的研究。

本书为天津哲学社会科学TJJL08-010资助研究的成果

前 言

本书的写作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年。几年前,我还是一个服膺于奥派理论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本书作为天津社科资助项目第一次完稿时,全书的论述基点和思想倾向都是自由主义风格的。然而由于各种机缘,本书初稿完成后我并没有立刻出版,而是沉下心来进行了跨学科的广泛阅读。这几年来,除了原本的经济学底子外,涉猎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领域的不少经典著作。我想,这几年的静读时光是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转折期,先贤大师们穿透纸背的深邃思想和博大视野帮助我爬到了更高的山麓,看到了更为广阔精彩的世界。以前的我用某一理论门派的单线就串起各种事件来解读世界,如今的我却看到了世界经纬交织的复杂性,以及纵深贯穿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因果链。对此,我的心中充满着感激和敬畏,感激于先贤大师们穿越时空的思想奉献,敬畏于宇宙世界的博大复杂。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我现在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因为我不再束缚于任何单一理论流派的门户之见,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社会科学研究就是盲人摸象的道理,每一种理论门派都只是摸到了真相的一部分,谁也不能垄断对真理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由衷赞同章学诚的名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我自当初撰写博士论文以来,就一直关注和思考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和作用问题,并陆续出版和发表了相关论著。我曾以为自由主义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理论路径,但在俄罗斯、拉美、东亚国家历史和现实的改革过程中,自由主义的药方往往流于空泛,“华盛顿共识”主导的激进改革也引发了更大的经济混乱和国家失败,市场远非万能,即使是欧美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也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陷入了政治和经济的体制性困境。我一度陷入了思考研究的困顿与瓶颈,这也是促使我开始跨学科阅读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我依然向往一个自由、繁荣、民主、强大的中国,但我不会再囿于自由主义或任何其他门户,它们都只是分别从各自特定的视角来解释世界,因而只应成为探求世界的思想资源的一部分,而非唯一的准绳。坚守自我、博采众长、超越左右才是中国创造未来的应有之路,也是中国克服中西文明对照时的“精神分裂症”,自信、开放、包容地吸纳转化各种文化思想资源的应有之道!

因此,本书对原稿重新做了很多修正、补充,由于时间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一些粗略、前后照应不足的地方。尽管如此,本书的出版就当是对自己一个思想成长阶段的总结和交代吧,站在当下,面对过去和未来,本书既是一个告别,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本书的修改写作过程中,感谢学生们马丽凤、娄勇、朱芮菁、王赛亚、李萌、王爽、王云峰等协助进行的一些资料搜集和汇整工作,也对出版过程中各方予以的热诚帮助致以诚挚的感谢!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章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解读	11
一、市场效率与国家作用——奥地利学派的自发秩序理论	11
(一) 知识分工、价格机制与市场的效率	11
(二) 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作用与政府干预	16
二、分配正义的幻象——奥地利学派的平等观	19
(一) 分配正义 VS 市场效率	19
(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政府的作用	23
第二章 马克思经济学的解读	32
一、市场效率、经济危机与计划调节	32
二、马克思论平等	36
(一) 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批判	36
(二) 马克思所构想的平等社会	40
三、平等、自由与人类解放	43
四、平等、自由与国家的作用	47
第三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解读	53
一、市场效率与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	53

(一) 市场效率、有效需求与国家干预——凯恩斯的理论体系	53
(二) 市场失灵与国家干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57
二、收入分配、平等与国家的作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另一面	61
(一) 平等和效率的相互促进——凯恩斯的解读	61
(二) 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国家作用——新剑桥学派的发展	63
第四章 几个重大问题的比较研究	67
一、政府干预——市场效率的增进者还是破坏者?	67
(一)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及其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	67
(二) 马克思对政府干预的批判及其与凯恩斯和奥地利学派的异同	76
二、政府干预——实现平等的阻碍还是助手?	80
(一) 平等、效率与政府干预的可能后果	80
(二) 平等、自由与国家的作用	84
三、国家的本质及其作用	90
(一) 国家的理性	90
(二) 国家的本质及其目标	96
四、私有制与国家	108
(一) 私有制与国家权力——奥地利学派的坚持与凯恩斯主义的背离	108
(二) 私有制与国有化?——马克思的真实解读	114
第五章 反思、批判与启示	119
一、市场、权力与理性主义	119
二、非理性与国家的作用	129
(一) “动物精神”与国家干预	130
(二) 理性与启蒙的谬误——非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拷问	136
(三) 国家作用的再反思与三大学派的未解问题	144
三、平等、分利集团与国家的角色	152

(一)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分利集团	153
(二)分利集团、狭隘利益与相容性组织、相容利益	155
(三)分利集团、经济增长与制度僵化	157
(四)赤字财政、滞胀与政府的囚徒困境	159
(五)社会分化与不平等——21 世纪资本论	163
四、关于现代制度建设的启示	168
(一)对“人性”的重新体认——现代制度设计的出发点	170
(二)市场经济与法治——现代制度建设的基础	177
(三)弱势群体、分配正义与国家权力——现代制度建设必须直面的问题	187
五、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塑	193
(一)国家 VS 市场——传统框架的零和博弈?	193
(二)国家和市场——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悖论	195
(三)国家和市场——新国家主义的启示与未解决的问题	199
(四)正和博弈的国家与市场——超越传统与新国家主义的框架	203
结束语	207
参考文献	214

绪 论

效率与平等是每一个社会都必然面临的重大抉择,这一抉择始终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面貌呈现。“效率”一词虽然出现在多种形式之中,比如劳动效率、生产效率、配置效率等等,但其一般性的含义都是指一定的投入量所产生的有效成果,其主旨在于最有效地运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效率的高低是决定社会价值量和社会财富量的根本因素,也是影响社会分配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自勃兴和发展以来,以其前所未有的高效率震撼和改变着世界。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与自由息息相关,从古典到现代的经济学家已经充分证明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是在个人自由选择和企业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高效率通过提供大量的商品产出也保障了自由,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的,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就是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在关于收入、资源和自由的分析中,重点必须是商品所能产生的自由,而不是商品本身。^① 因此,对效率的探讨必然涉及对自由的探讨。然而,自由市场在快速运转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由此,效率与平等(连带着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也就变得越来越突出。

平等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演变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原则的权利平等,亦即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强弱、阶

^① 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大出版社,2002,第62页。

级、地位和出生的差别,都享有同等的政治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良心的自由与思想自由、组织政治团体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等等,在法律面前,人人皆平等享有这些权利。在宪法文献中,权利平等往往被归属于形式平等。权利平等是与自由相对应的,是自由的前提条件。近代西方社会从专制集权、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脱胎而来,在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平等”主要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权利平等思想在近代的崛起,和市场经济的勃兴密切相关,正是以分权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个人意识和个人权利的觉醒。“人人生而平等”这一表达权利平等的思想是近代政治哲学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促成的。因此,自由促成了权利平等,而权利平等反过来又成为自由的保障。正如卢梭在分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为权利平等所做的最强有力的辩护那样,在人类的根本政治目标中,平等较之自由更具基础性价值,因为正是平等的丧失才导致了人对人的依附与奴役,即自由的丧失。自由、平等和人权,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三者经常表达同样的意思。^①

平等含义的另一个层面则是指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平等,在宪法文献中,它往往被归属于实质平等。自古以来,不同的社会结构总是决定着不同的财富分配格局,在这一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或不利地位的群体一直都提出了要求分配平等的呼声。近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提供了广泛的权利分配,但其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固然被作为用来提高市场效率、扩大国民总产出的激励或刺激,但它同时也造成了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从而衍生出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推动着人们不断去反思市场,不断提出和修正借由国家权力来实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

平等是理解当代政治理论中各个流派之间交锋与论辩及其历史演变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理解政治伦理、政治哲学中其他观念的基石和出发点。

^① 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97年。

而实际上,不论是在政治学领域中还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对效率和平等的思考一直在正义理论的语境中决定着对社会制度的评判。虽然自古希腊以来,人们从未就正义的观念达成一致意见,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正义似乎“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可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当我们仔细辨认它并试图解开隐藏于其后的秘密时,往往会陷入迷惑。”^①现代西方著名法哲学家凯尔逊也曾说过:“自古以来,什么是正义这—问题是永远存在的。为了正义的问题,不知有多少人流了宝贵的鲜血与痛苦的眼泪,不知有多少杰出的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康德,绞尽了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问题仍未获得解决。”^②不过,比较一致的是,西方近代思想家们普遍都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相对的范畴中讨论正义,并将之作为具体的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的评判和设计原则。罗尔斯就把他的正义论称之为“公平之正义”,即社会权利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合理的社会制度应确保“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③罗尔斯认为,有效率的社会结构有许多种,而不是一种,效率的社会价值相对于社会平等来评价,仅仅效率原则不可能成为一种正义原则,效率和平等都必须符合社会的正义原则,不能撇开社会的正义来强调效率问题。

政治哲学关注的社会正义包含着人权、分配正义、关怀弱势群体等重大议题。社会正义首先要求以制度的方式来体现和保障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亦即保护个人所拥有的对于自由、平等、生命和财产的权利,这样的人权是人的道德权利或自然的权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应该得到宪法的保障,以及政府、团体和每一个人的尊重。如果人权的关键是自由,那么分配正义的关键就是平等。在分配领域,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当然,完全平等的分配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所以,正如罗尔斯把“正义意味着平等”转变为“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是正义的”那样,人们只能从追求“完全的平等”转变为追求“最大程度的平等”,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在

①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② 凯尔逊《什么是正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8期,第6页。

③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303页。

这一意义上提出的不平等分配的正义原则。分配正义最终体现的是对弱势群体关怀,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社会的不平等最严重地体现在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阶级身上,因此,探讨分配正义的原则往往就是为解决这种不平等而提供制度设计的原则。

虽然今天的经济学有着摆脱政治学和伦理学而走向类似于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的纯经济分析的倾向,但实际上,人类的经济活动负载着人的理性精神,与正义相关涉,是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摆脱价值判断的。无论从“经济”的词源,还是从社会历史、政治以及具体的经济实践来看,经济与正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相关性。其实,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正义理论已经或明或暗地进入到了经济分析体系当中。对人权的保障实质就作为权利平等成为个人自由的前提,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运转的坚实基础——众多分散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分配正义则直接成为了经济学分析中所指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平等。早在亚里士多德开始,分配正义就是经济正义最为重要的部分,它不仅涉及初始资源、权利等的分配,也涉及社会产出的分配,既涉及产权的分配,又涉及对市场交换结果的政治面目性再分配。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在分配正义的意义上对“平等”展开争辩和讨论的。各学派的平等观和分配理论当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对社会底层或弱势群体的关怀,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直接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目光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伦理思想之中贯穿着对正义问题的思考,可以说,马克思的正义观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背后一只“看不见的手”。

因此,对效率与平等的思考与抉择必然要深入而广泛地牵涉到自由、效率、平等、正义等诸多范畴,要与正义理论发生思想的碰撞。更一般地说,正义理论的实质就是制度设计,即按照正义原则来设计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政策,以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正义理论作为一种构成和线索浸透在斯密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等政治经济学传统对制度的思考和批判中。而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对效率与平等的抉择就将国家作用或政府干预这个重大问题凸显了出来。在分配正义意义上的平等,从其起源、价值取向和作用来说,无疑是

为了限制、规范和调节市场经济运行及其结果,在本质上,它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商品化相对立的反商品化努力。追求分配正义或平等必然要求以道德伦理规范和政治力量去控制、约束商品交换过程和结果,由此,国家或政府这一唯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权力机构就至关重要。^① 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关键组织,是人们借以纠正市场结果的主要手段。正如诺斯所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②对效率和平等的不同解读和抉择,必然导致对国家职能或政府作用的不同诉求,这种不同的诉求是形成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纵观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演变,对效率、平等及其中的国家作用的不同思考已成为当代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的焦点。传统社会主义方案试图以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取代市场制度,西方福利国家则通过对市场的政治干预和政府的合法强制再分配来限制市场造成的不平等,以使人们不再完全受市场偶然性的支配。20 世纪的历史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兴衰的历史,其核心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语境下的效率、平等及其中的国家作用问题。

21 世纪是一个反思的世纪,人类社会已积累下的大量试验和实践推动着我们去反思,为此,我们有必要用新时代的经验和眼光去重新挖掘和寻找理论资源,以便能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制度轨迹和社会发展做出更为深刻的洞察和理解。本书选取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比较研究和解读的对象,考察其在效率、平等及其中的国家作用问题上的探索 and 思想。之所以选取这三大流派,既是因为它们的相关理论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因为它们的思想与争锋恰恰典型

① 在本书中,政府是指拥有合法暴力的统治机构,“国家”并非指广义的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而是指狭义的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因此本书中的“政府”与“国家”两个词是通用的,用英文来表达即是 state 或 government。实际上,当代政治学和经济学在探讨国家或政府作用时,都存在这种通用现象。本书所探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论及“国家”或“政府”的。

②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 20 页。

地反映了学术界关于市场效率、个人自由、分配正义、国家干预等问题的主要观点和重大分歧。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个人自由所激发的高效率带来了长期的社会繁荣,使人们普遍认同斯密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即市场经济中个人选择的自由不仅是经济效率的前提,而且是整个自由社会的基础,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是相容的。但是,到了19、20世纪,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运转同样深刻地造成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又威胁到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平等。于是,基于平等正义的立场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马克思经济学,在大萧条经济危机中应运而生宣告市场自由放任结束、主张国家干预以促进效率和平等的凯恩斯经济学相继问世。马克思经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剖析,设想了一个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消亡、实行计划调节经济和按需分配的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凯恩斯则提出在保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引入国家干预来促进平等和经济增长,其后继者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研究了一系列调节总需求的政策,企图通过寻找市场与政府的最佳结合点来兼顾效率与平等,另一后继者新剑桥学派(亦即后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分配是引起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不但不能解决分配失调问题反而使之更加恶化,因此,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借由国家干预来实现的收入分配政策,认为只有使国民收入分配更为公平合理,才能使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安宁,实现凯恩斯《通论》中的社会政治结论。然而,与此同时,以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则继承了自斯密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依然捍卫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指出,企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分配正义只能是一种幻想,人们不仅不能由此得到平等,反而还会丧失自由。奥地利学派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市场秩序,并由此进入到通过法治宪政来塑造有限政府的制度思考。

三个学派的理论各成体系,代表着对现实制度不同视角的批判和解读,而其相互的思想激荡则为我们当今的制度反思和制度建设提供着深刻的启发。如何调节市场效率、个人选择自由和正义平等要求之间的矛盾,已成为

现代社会制度进化和演变的重要动力之一,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的思考和争论,十分有助于我们洞察和思考现代社会制度的这一演化过程。如今,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欧洲福利国家的普遍经济危机,中国在高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攀升的基尼系数,都提出了重新思考和探索效率、平等及其中的国家作用的迫切性,因此,对三大流派相关思想的比较研究和解读有助于充实和丰富我们面对当代社会重大抉择的理论视野和理论资源。

虽然目前国内外对三大流派关于效率、平等与国家作用的研究较多,为本书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巨人的肩膀,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和问题。第一,在对各学派关于效率与平等的考量研究中,大多单纯停留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关系的权衡分析上,而没有进一步联系和涉及其背后的实质性问题——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这一现象不仅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很普遍,在关于效率与平等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领域也很普遍,只有极少数学者针对中国的现状认识到了,效率与平等在根本上是一个关系到政府权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性的问题,我们不应在效率与公平谁优先这样的“伪问题”上争来争去,而是要努力寻找经济发展与平等、社会公正之间的一致性和动态平衡关系。的确,不论是效率优先还是平等优先,都深刻地涉及国家(或者政府)的角色问题,涉及国家和市场关系的重构问题。对平等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国家作用的不同定义,凯恩斯提出国家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通过对收入分配的分析提出实质平等,奥地利学派也是因为坚持权利平等才信奉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马克思则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过程中构想了国家消亡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分配正义或平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市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如前所述,分配正义或平等是为了限制、规范和调节市场经济运行及其结果,对平等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国家作用的不同诉求,而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也决定着效率和平等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实际上,当分配正义或平等作为一个社会的主要问题凸显出来时,恰恰说明了市场与国家两者的关系已经失去平衡。因此,必须把国家权力及其作用纳入到对效率和平等的权衡抉择中,才能得到本质全面的观察。